

龙泉山古村落形成与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探析

涂明星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龙泉山濒临梁子湖,土地肥沃,物产阜盛,交通便利,宜居宜耕,世人奉为“风水宝地”。历代移民带来了高起点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加上众多世族慕名而来,共同推动地方经济和区域文化的发展,形成典型意义的封建文化村落。

关键词:龙泉山;古村落;文化生态;人文环境

中图分类号: G127.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14) 05-0005-03

2012年11月16日,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官网公布:位于江夏区龙泉山内的营泉村列为国家级遗址遗产型历史文化名村^[1]。龙泉山位于武汉东南部,原称江夏山,俗称夹山,唐天宝中改为灵泉山。朱明楚藩占山造寝后,改为今名。唐宋以来,众族集聚,人文蔚起,“名臣豪翰,先后相望”(张郁《灵泉乡贤文》)^[2]。各类景观鳞次栉比,百姓乐业,商贸兴盛,形成较为典型的封建文化村落。

一、自然环境

(一)生态环境 适宜居住耕种

龙泉山地处北纬30度附近,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日照时间较长,雨量相对充沛,土质以潮土为主,适宜动植物生长。1973年以前,梁子湖从北、东、南三面环绕龙泉山,湿地效应明显,宜居宜耕。

(二)物产阜盛 助推经济发展

山地有草柴资源、木材资源、药材资源、野生菜菌资源等。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小麦。农副产品有绿茶、松树菌、蕨菜等。自然生长多种中草药材。周边矿藏有石灰石、耐火黏土、高岭土、膨润土等。梁子湖鲜活水产品有鱼、虾、蟹、贝四大类,其中以武昌鱼最为

著名。莲、藕、茭白、菱角、芡实等水生植物产量相当可观。富余产品用作交易,拉动商品经济;矿藏适合发展手工业生产,既满足物质生活需要,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三)江湖联通 促进交通便利

《水经注·江水之三十五》云:“江之右岸当鹦鹉洲南,有江水右迤,谓之驿渚。”被郦道元称作“驿渚”的,是武昌及其以远地区,湖泊星罗棋布、水陆相间的一片区域,加上长江呈环抱状,形成庞大的江湖联通系统。陆路交通方面,龙泉山东望豹澥达鄂州,西越五里界东坝到纸坊,北经流芳李家桥联通武昌城。水陆交通极其通畅,既享有得天独厚的舟楫之利,又拥有良好的地缘优势,成为通衢之地。

(四)地质构造 造就奇特景观

地质构造形成龙泉山奇特景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梁子湖自然下沉为湖被赋予了更多的美丽传说色彩;地质科学证实:梁子湖属地质构造湖。“梁子湖凹陷,位于蒲圻至梁子湖一带,是晚三叠世以来在印支拗褶带上形成的继承性凹陷,呈北东—东北向弧形延伸。”^[3]但时至今日,梁子湖周边区域的人们,仍然默认梁子湖是“高唐县”下沉为湖的传说。在代代传诵的美丽传说中,人们融汇了天人感应、惩恶

收稿日期:2014-10-22

基金项目:2014年度武汉市属高校产学研结合项目“龙泉山历史文化源流及其价值发掘研究”(项目编号:CXY201422)。

作者简介:涂明星(1963-),男,湖北武汉人,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地域文化与旅游文化。

扬善的内涵,愈发增添其神秘色彩,令人敬畏有加。二是龙泉山拥有众多的涌泉,而且某些“应验”的迹象被渲染得神奇无比。“灵泉”在唐代由江夏李氏首次发现,原江夏山由此更名灵泉山。凿地得泉,水井冒气、喷水,均为自然现象。但科技不太发达的古代,普通涌泉被认作“灵泉”。“斯泉无源亦无流,无清亦无浊。其色碧绿,其味甘美。烹茗香,浣衣洁,洗目明,濯肤泽,不与凡水类,其灵也如是。”^[4]“(山)中有一泉,澄清碧湛,旱祷辄应。”^[2]“灵泉寺,在灵泉山,产茶。寺右有泉,四时不涸。”^[5]“寺右有茶圃,茶可愈疾。”^[4]除灵泉古寺旁的一处涌泉外,另有两处非常典型著名,地方志书也有相关描述。涌泉是在石灰岩地质、暖湿气候、梁子湖水、地下水等因素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位于龙泉山的玉屏峰从南麓,开有多处石灰矿井,说明此地具有石灰岩地质明显特征。在附近周边地区,遍布泉眼。常有村民在田间地头掘坑蓄水,用以灌溉。“灵泉”一直作为龙泉山的一张靓丽名片。

(五)象形地貌 增添神秘色彩

龙泉山由玉屏峰丛和天马峰丛南北两列并行峰丛组成,东西延绵起伏约9千米,南北最大跨度约3千米,止于梁子湖畔,势如双龙,在珠山呈似合非合状,形成“二龙戏珠”之势,山间形成葫芦形盆地。其地形地貌有六大奇观。一是葫芦形盆地仅有东西两大出口。东边山口濒临梁子后湖,西边有凤凰山扼守进山咽喉。二是两山自西向东并行,在接近梁子湖边相约而止,相向而顾。三是两山山头之间,凸起一圆形山丘,颇有“二龙戏珠”之势。四是天马峰南麓,有坡地形似巨型“太师椅”,在其对面南山笔格峰,均匀地隆起五个峰峦,汉有樊建、楚夷王刘郢客,元有威顺王宽彻普化,明有楚昭王朱桢均视为“五龙捧圣”之地。五是在天马峰向南伸出一条岭岗,称为“横龙岭”,直通对面龙帐峰貌似雌性生殖器的山隈,坊间传为两龙作交配状。六是两列峰丛为旱龙,另有两条水龙。横龙岭东西两边各有一条古河道。东边一条小河向西把梁子湖水引到太师椅和笔格峰之间,西边小河向东把梁子后湖水引到马鞍峰和石莲峰之间的“龙凤呈祥”之地。古人素有土地崇拜观念,加上堪舆大师刻意推演,于是认定这是天造地设的“福地仙壤”,便想方设法占据一席之地,以求千秋万世荣华富贵。

二、人文环境

龙泉山古村落,社会组织结构表现为政权和族权密切结合的封建秩序;以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生产结构,和自给自足经济形态为主要特征,初步形成了区域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交易市场。

(一)宗法体制 维系地方社会

自汉到明,众多家族陆续迁入,同姓宗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族而居,逐渐形成自然村落。封建国家县以下的乡村社会是一个以宗族组织为基础、以保甲制度为载体的管理体制。官府选任具有一定声望的宗族领袖充当“地方头人”,作为地方社会的代理人。北宋,冯式徙居咸宁后,专程致信请求盟伯予以关照。“恭惟杜老盟伯教下,式有汉世始祖冯舜,生江夏夹山里,土名冯家澥,传世九十四代。……先人坟墓,尚在故乡,乞同里仁贤君子,念桑梓依依,垂怜赐顾,风晨月夕,佩德不忘,式百拜致书。”(冯式《寄同乡书》)^[2]到了元末明初,张家长房长子长期“当夹山三里里长差役”(张氏宗谱(金鉴堂)第2卷52页),专事课督赋税。盟伯、里长把持政权和族权,履行地方治安、教化、赋役、互济等自治职能与基层政权的管理职能。在家族中,族长通过订立家规等方式来维系族内秩序。具有家族地缘化、族长集权化、秩序等级化、功能多元化等特征,维持了封建制度下的地方社会稳定结构。

(二)经济业态 呈现正态发展走向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龙泉山既靠山又靠水,而且比较充分地利用了自然资源。从周边的考古发现和史籍记载来看,龙泉山区域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业态基本呈现正态发展走向。

1.农业得到长足发展。因为水利资源丰富,汲水便利,土肥雨多,垦种面积扩大。加上外来移民大量迁入,加快了开发速度。以水田种植水稻、旱地播种小麦为主体的粮食种植结构逐渐稳定下来。

2.手工业的产生、发展。手工作坊生产日常用品。在流芳出土三国时期青瓷的狗、牛车、院落,表明陶瓷制作已经超出了日常用品的范围,而且生产装饰工艺品。在龙泉、湖泗、土地堂等地共发现宋代登记窑堆85处^[6],烧制青瓷、青白瓷及白瓷。家庭手工业有棉纺、织布、染布、制衣等。“男务农桑、妇勤纺织”(沈如筠《垂裕后昆文》)^[17]成为农耕社会的典型特征。

3.日常生活用品、农副土特产品、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促成区域交易市场形成。“自汉以来,人物尚稀,至唐而渐盛,至元而极盛。唐时古市在山外,居聚致货,民往往利之。宋时迁市于内,约有数百户,至元时则蔚然一都会矣。”^[2]交易物品主要有:“大宗的陶瓷和大量的水产品,以及茶叶、布匹、粮食”^[8],另外还有农业生产工具、农副土特产品、药材、文化用品、祭祀用品等。“灵泉古市,始于汉,迄唐寔盛。时市在山外。宋自张芸叟始家天马峰下,锄地得金巨万,列廛召商,集至数百户口。元则蔚然大镇。后毁于红巾贼。明初复聚,闾閻閭閻鱗萃,烟云淳郁。”^[4]

(三)土地信仰 引来世族扎堆

古人追求天、地、人、神关系的多元和谐,把“风

水宝地”作为通往最佳生存空间和生活状态的选择。环境优良的处所更容易在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中产生显胜效益。五十六个家族慕名迁入此地。樊家的龙泉始祖樊建，汉初分封入居，食采不息，并将樊哙墓迁葬天马峰南麓；江夏王李道宗之后，居天马峰东南麓，后改姓杜；李暄，因避伯父李邕之难带着堂弟李洞卜居白云阿。张训民因祖父张叔夜、父亲张栋死于“靖康之难”，逃迁此地，娶樊家之女繁衍生息；曾、董两姓分别于宋初和元初迁住龙泉山；“沈如筠……为观文殿大学士，见元末世乱，弃官隐于楚黄，复徙江夏之灵泉山，家焉。”^[4]邹家随楚王朱桢分封而入籍。“张、沈、邹、杜、樊、曾、董、李，里称八达者为最。以楚藩夺其地为九寢而墟矣。”^[4]以上八家抢先占据吉地，后来的退求其次，只能居住珠山和横龙岭之外地段，被称作“山外”^[2]。戴德彝与张添祐为同年进士，罹祸后，其子戴光迁入江夏，张氏“垂念孤儿，娶以族婚”（张添祐《同年戴德彝相贊》）^[2]在山外也有一些取得功名的家族。如上家有上泰，中景泰四年（1453年）举人，五年（1454年）进士，“初授行人，升吏部员外。”^[4]成化中出任广东右参议^[9]。其后有上国光为进士^[2]。众多世族陆续迁入，形成了扎堆效应。

（四）移民更替 丰富土著文化

历史上江夏地域的居住人群，随着民族的大迁徙时常发生变动。“东汉永元十四年102年，官兵镇压巫山乡民反抗，徙其徒从于江夏。”^[10]“明洪武初，移民垦殖，江西人在境内定居甚多，在县人口来源中占较大比例。”^[10]大规模的移民潮，给予当地社会的直接影响表现在：一，移民促成人口总量变化，人口快速增长，并且带来了高水平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二，部分移民带来了较高起点的文化。如江夏李氏有李鄘、李磥出任唐朝宰相，唐肃宗敕建李鄘“蓼莪堂”，唐昭宗敕建李磥“累世公卿”牌楼，李磥祖孙五代人建造的“万卷书楼”，在当地文化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张训民祖父张叔夜、父亲张栋均为科甲人士，张训民南迁时携带一方刻有“状元张栋”的砚盘。三，移民还对迁入地的社会风俗习惯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营造了民俗风情南北交融、民间文化色彩斑斓、乡土习俗丰富多彩的局面。以语言为例，江夏境域方言的复杂程度在四个郊区中可居首位。

（五）勤学苦读 营造文风炽昌

“灵泉山势盘旋，烟云万丈……既无俗客，又少

喧尘，亭中微吟，楼上高歌”（张辂《问月轩》）^[2]确为读书佳处，这个僻静村落传承厚学尚贤之风，科甲蝉联，硕彦迭见，堪称科举之乡。读书做官，金榜题名，成为龙泉山历史文化中一道绚丽的风景线。《灵泉志》中存有大量描述读书人励志芸窗、勤学苦读的诗句。他们的理想是“着意攻书勤十载，登科拟作状元郎”^[7]，其生活状态描述为“开门见山水，拥书忘早昏。”^[7]龙泉山区域由唐到明，共有荐辟和贡生10人，举人39人（次），进士15人。其中张家荐辟1人，贡监1人，中举13人，进士5人。科举盛况空前绝后，尤其是明初出现井喷现象，张家叔侄轮流上榜，李家兄弟三人同榜，一时传为佳话。

三、结语

地理环境是古村落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经济文化、制度环境是内在因素。正是由于区位环境、交通优势、经济基础、文化环境、制度环境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构成了物的要素。在人的要素方面，土人群体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武汉市历史村镇保护名录规划批前公示 [EB/OL].http://www.wpl.gov.cn/pc-41150-78-0.html,2012-11-16.
- [2] 张高荣.新编灵泉志[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
- [3] 湖北省地质矿产局.湖北省区域地质志[M].北京:地质出版社,1990:602.
- [4] (清)陈元京,范述.江夏县志[M].乾隆五十九年刻本:卷十二 57页、卷五 16页、卷十五 15页、卷十一流寓 2页、卷十五 15页、卷七 3—4页.
- [5] 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清康熙湖广武昌府志校注[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200.
- [6] 杨果,陈曦.宋代江夏地区制瓷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探析——以考古资料为中心[J].江汉考古,2005,(3):77.
- [7] 张高荣.龙泉山古诗词集[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
- [8] 傅钧烈.灵泉古市[J].武汉春秋,1983,(2):50.
- [9] (清)金光祖.广东通志[M].康熙三十六年(1697)刻本:卷十三 30页.
- [10] 武昌县志编委会.武昌县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79.

[责任编辑：石芬芳]

(下转第 17 页)

(上接第 7 页)

Analysis on the 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Villages in Longquan Mountain

TU Ming-xing

(Wuh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Software and Engineering, Wuhan 430205,China)

Abstract:Longquan mountain is located on the verge of Liangzi lake with fertile land, rich property,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livable and appropriate tillage. It is called the best land. Immigrants who brought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culture, with many noble familie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and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se typical feudal culture villages.

Key words:Longquan mountain; ancient village; cultural ecology; human ecology